课外培训班为什么被追捧

课外培训班的现状：

现状1，课外培训市场火爆，收入可观

随着家长对子女教育差异化需求的日渐增加，我国课外补习机构的根系日益壮大，市场异常火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规模估计在700万到850万之间。

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是什么概念？回顾2015年我国各省财政收入，全年财政收入最高的是广东省，9364.76亿元，江苏、山东分别以8028.59亿元、5529.3亿元位列二三位。也就是说，我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已经与一个发达省份全年的财政收入相当。

而支持这一庞大市场的是可观的学生数量。目前我国中小学阶段在校生总数稳定在1.8亿至2亿左右，而参加中小学辅导机构的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以2014年为例，我国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更是高达70%”。而除了实体培训机构的可观是收入外，处于政府监管边缘的中国的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已达到1.44亿，手机教育用户规模为1.2亿，在这部分的人群中，更是囊括了婴幼儿的教育培训。

现状2，课外托管和培训机构缺良莠不齐，缺乏规范监管。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校外教育培训满足了广大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是对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和拓展，但目前的情况是，众多校外培训班条件简陋，手续不全，胡乱收费。部分校外培训机构没有自己的培训场所，大多是临时租用的写字楼或店铺，存在消防、食品卫生、交通等安全隐患；部分机构属无证经营，缺乏合法的办学资质，缺乏必要的市场监管；培训收费没有标准，比较混乱。此外，还存在培训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我国对课外辅导机构有明确的要求：培训机构必须有证有照经营。可是，现实中这种有证有照的监管方式反而导致大量监管之外的情况发生。目前很多课外辅导机构只是经过工商部门登记，并不归教育部门管理，教育部门对此类辅导机构没有行政执法权。比如，有的培训机构只有营业执照没有办学许可证，在这种有照无证的情况下，机构会首先办理教育咨询的工商营业执照，之后再扩大经营范围，开展教育培训等超出经营范围的业务。再比如，有些培训机构既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办学许可证，属于无证无照经营。按理来说，无证无照机构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与无证有照相比，无证无照的情节更严重，但是在现实中无证无照反而处于监管之外。教育部门认为这种机构未办理办学许可证不归教育部门管理，工商管理部门认为也不应该纳入他们的管理范畴，结果就是此类机构长期处于欠缺监管的状态。

另一方面，目前还没有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进行明确限制。许多国家明确禁止超前教育，并且出台了《超前教育体系法》。比如，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就不能培训七年级的内容，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教育体系。我国已出台了学前教育‘去小学化’的规定，但在落实上还是流于形式。现在的幼小衔接课外培训班更是异常火爆。孩子在幼儿园入小学期间就要学会一年级的知识，否则跟不上老师的课程进度，因为许多学生在课外培训班都已经学过了，于是老师就越讲越快，甚至不讲了，跟不上课的学生就只好从校外培训机构补回来。

已经有专家提出，教育培训机构应该按照工商企业进行管理，不用办理办学许可证，但是应该履行备案制。也就是说，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都必须到教育部门备案，教育部门根据备案项目建立起教育风险准备金。这样一来，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都被纳入了监管体系，相关部门也可以对机构进行过程性监管。目前我国的前置性审批存在情况复杂、落实困难等问题，备案制不失是一个好办法。

    总的来说，不少教育培训机构都存在无证无照或者各式各样的违规经营问题，相关部门必须依法治教，通过立法来规范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同时也要对教育培训机构的违法经营、超前培训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

现状4，课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正在绑架学校教育。

如今，超前补习已经成了课外补习的基本模式，机构实施超过课程标准和学校进度的学科教育，即“抢跑”或“提前教学”，而课堂教学主要采取解题、做题、刷题的“应试教育”模式。以北京为例，培训机构建立了系统的择优体系，而择优体系主要依靠其“超常体系”，即五年级学完小学课程，六年级以复习和准备“小升初”为主；而在一些对学龄前儿童“幼小衔接”的暑期课程中，数学的难度甚至已达到小学三年级的程度。这样学校里教的内容，大部分孩子在辅导班里全学完了，所以老师就越讲越快，甚至不讲了，这样孩子就更要去上辅导班，没有上辅导班的孩子在课堂上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进度，也被迫不得不去上辅导班。而且不能只让孩子自己学，家长一定要督促、陪同孩子，因为辅导班只有短短的2个小时，不可能全部在课上吸收，所以回到家还要复习。

由此看来，我国课外培训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而是为了满足部分患有“落后焦虑症”的家长的需求，帮助他们“逼着”孩子以超越他人的方式来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将家长的焦虑连带着这种错误的学习价值观传给了孩子，最终一起陷入竞争压力不断攀升的恶性循环。也正是基于这种逻辑，这些课外培训机构才无视正规学校的教学进度和孩子的认知规律，通过高强度的强化训练提供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这种培训或许能在短期内带来机械式的知识增长，但难以促进深度学习，更别提促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了，甚至还有可能造成长期的伤害。

当前补习机构绑架学校教育的行为远比想象的严重，超前教学打乱了学校原本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得学校不得不更改自己的教学计划，乃至冲击了整个国民的教育体系。

补习班缘何被追捧？

补习班缘何被追捧？

首先，从政治大环境看，现阶段城镇学校发展的不平衡性，交际之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诱发了择校等教育竞争行为，从而形成课外补习的土壤。而对于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让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赢在“起跑线”上成了诸多家长内心的一颗“安定丸”。补习班无疑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升学竞争中取得成功，而这种教育的成功最终可以使学生获得优势社会经济地位。

而剥开现象，更深层的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有重教传统，‘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等观念更是代代相传、深植民心。

教育评价制度的单一是导致“补习班盛行”的罪魁祸首。虽然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强调高考改革和综合评价改革，但如果深入分析，这样的改革依然没有触及到单一评价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依然是有分数在评价学生。这样的评价机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的学生都站在同一跑道上，那么家长的焦虑永远不会得到缓解，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跑到前面。在他看来，如果不改变评价制度，那么减轻课外补习负担也终将成为一纸空谈。

从另一方面看，长期以来国家一直较为关注校内减负，出台了一系列校内减负措施，比如严格控制校内时间和校内课业量、禁止补课等等，而这部分减下的“负担”却被处于“教育竞技”漩涡中的家长重新在校外补习班里找了回来。

而类似于三点半放学这样的政策则直接驱动了众多无力接送孩子的家长将孩子送进补习班和托管班。

**孩子和家长为什么愿意花钱给自己增添负担？**

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家长来说，去补习班无异于“花钱买罪受”，但即便如此仍然抵消不了家长们的热情。

而这种热情的来源，首先就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全世界像中国一样如此重视子女教育的国家其实并不多，而且多数都是东亚地区的国家。

台北南阳街被称为“补习一条街”

美国作家何伟在《寻路中国》中说：“（在中国）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曾写到：“在美国，华裔的学习负担也是最重的，唐人街上辅导班比比皆是，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纽约400余家备考中心，超过1/4都是过去四年出现的，1/2分布于皇后区与布鲁克林，尤其是法拉盛和日落公园——这些都是著名的华裔区。”

而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对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2017全国中小学生课外培训调查》显示，47.13%家长在培训费投入为5001-20000元，语数外等主科类补习班培训班成为主流，而初高中阶段舞蹈、绘画等艺术特长补习价格更为惊人，一课时小则500，大则上千。

课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做大，很大程度上依靠“减负令”被驱赶出来的知识传授

而且，现在的课外补习班与以前不同。以前的补习班讲的是超越学校所教授的内容，而现在大量是基础课程，无非是一年级提前学二年级，五年级提前学六年级。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一些优质学校会联合培训机构会建立系统的择优体系，而择优体系主要依靠其“超常体系”, 即五年级学完小学课程，六年级以复习和准备“小升初”为主，“抢跑”的起跑线不断下移。

由于“教育资源均等化”并没有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控制在少部分学校手里，规规矩矩实施“减负”的学生，根本进不了好的初高中学习。所以，学生和家长都卯足了劲，要进入到一个优质学校。

当然，根源还在于中考、高考制度的“指挥棒”。在升学考试时，就算评语再好，也不能超越比他高一分的学生，总体来说，还是成绩和排名。“减负”只是表象，但中高考不变，名校不变，家长认清现实，还是做出了“增负”的选择。

“三点半现象”，即学生3点半放学后，父母正在上班，孩子无人接管

教育部门的一些政策，也为课外补习班的生长提供了机会。比如今日话题前几天提到的“小学三点半放学现象”，家长还没有下班，如果家里没有老人接送孩子，不去补习班还能去哪儿。

**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应该要反思了**

2017年4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谈日本教育减负30年来的反思。

日本从1976年底正式开始“减负”，手段总结起来就是少学东西、少上学、少考试，按要求要“宽松而充实”。然而，30多年过去了，减负政策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果。

在日本想要有一个好成绩，就去上补习班，想要考上好大学，也得去上补习班

首先是私立高中迅速崛起，成绩好但学费昂贵，因为公立都在减负，私立没有；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

其次，从1970年开始，整体家庭的教育负担不光没降低，反而增加了，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等于扩大了不公平。

再次，不仅“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子女养育成本也是一剂避孕药，过大的教育负担让中产家庭并不敢冒然多生孩子，对社会发展并不利。

并且造就了日本特有的“宽松世代”，并且被社会打上了脑袋空空、目中无人、胸无大志、唯唯诺诺等标签。

日本近年来不断对“宽松教育”进行反省。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

另外，中国教育界需要明白，“减负”也好，“宽松教育”也好，对那些对自己期望较高的孩子并不适用。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慕斯曾经写了一部报告文学《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惠妮中学成长纪实。惠妮中学，也就是“虎妈”女儿所就读过的学校。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纪录了一个高三女生的一天，标题就是：魔鬼数字4，睡4个小时，喝4杯咖啡，得4.0的GPA。这样的高中生比绝大多数中国的高中生还要辛苦。在美国，很多能读常青藤大学的学生，负担一点都不轻。

想要读好大学的美国高中生，其实一点也不轻松

所以，一刀切减负的问题有两个：从因材施教的角度来说，对自己期望较高的孩子感到“吃不饱”，而又因为减负，不得不去课外补习班；而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说，教育培训资源稀缺的农村以及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城市贫民子弟，上升通道变得更狭窄了。

日本用了30年来“减负”和“反思减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减负”和“应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应该针对不同的孩子，在两者间取得一个平衡。

在提倡为孩子学习减负的大环境下，为什么课外辅导班还这么火呢？这不是单方面的原因，是由学校、学生、家长共同形成的，并不是取消课外辅导班就能解决问题的。

一、学校，1个老师要教几个班上百个学生，自身又要参加辅导培训升级考证等事宜，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每个学生的情况，制定具体有征对性的辅导方案，只能釆取大众化辅导。

二、学生，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智商都不一样，在学校课堂上能掌握70%的知识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还要看学生自不自觉。

三、家长，并不是每个家长都有机会做着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一般企业里12小时工作时间是正常的，一天工作下来基本上都累的不想动了，哪有精力辅导孩子。况且家长文化水平各有不同，并不是每个家长都有能力辅导孩子的。

总而言之，课外辅导班解决了学校、学生、家长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才会这么火。

措施：

课后托管应允许第三方机构进校提供服务

声音

北京市教委发布实施《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近4个月。原则上学校每天在完成规定课时之后提供课后服务，时间到下午5点30分，具体时间由各区、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为学生提供课后托管服务，包括提供场地条件和管理服务，学生自主安排户外活动、校内阅读、自习、做作业等活动……

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尽管有了指导意见，但是学校提供的课后托管服务仍然无法满足家长的高需求。对此，不少市政协委员为学校课后托管服务开出“药方”。

药方一：关于托管老师

增加经费让参与的教师有获得感

“现在政府的经费投入核算下来每名学生每月仅38元，平均到每位老师，一节课的补贴不足100元，这种标准远低于市场价格。”市政协委员、芳草地国际学校校长刘飞提到，目前在校教师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再让教师增加工作时长，在校教师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如果能够有足够的经费，一些可以参与的教师加入其中也能有获得感。

刘飞表示，要满足家长的托管需求，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经费作为保障，让学校能够有能力、有意愿承担课后托管责任教师费用的成本。

药方二：关于托管内容

允许第三方机构进校提供内容服务

课后服务指导意见出台之后，不少家长表示，学校课后托管的内容并没有预期的那么丰富。

对此，刘飞认为，相关的文件中没有清晰界定课后托管的具体内容，以致家长对学校课后托管有了更高的心理期待。“政府应该将课后辅导的内容明确，消除家长们对课后托管服务的误解。”

刘飞还提出：“政府满足基本需求，一些额外的特殊需求请第三方正规的校外培训机构来完成，满足不同的需求。比如，学校负责学生到下午5点半的托管工作，5点半之后的托管工作就可以请合规的校外培训机构介入。”

“学校可以跟监管到位、具备办学资质的校外托管机构进行交接，家长通过委托学校的方式，请学校‘手递手’将学生送到第三方机构中进行后续的课后托管和个性化特长辅导，也可以通过学校移交权责的方式，请正规机构进入学校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服务，学校可以提供免费场地。”刘飞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定要加强对第三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保质保安全。

药方三：关于托管费用

家长可以适当分担个性化辅导费用

“各个学校的课后服务都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但各校的补贴都一样，能不能在课后服务上分类处理，仅看管费用由政府负担，如果学生还想发展特长，那么家长应该多分担一些。” 市政协委员、中关村三小校长刘可钦说。

刘可钦表示，目前政策不允许在学校内开展收费特长培训服务，可是如果学生参加课外兴趣班，收费会更贵。希望在制度上能够有一些创新，依靠政府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利用课后托管时间发展学生兴趣，但同时家长也可合理分担一些费用。

“学校的收费在一定程度上比培训机构收费是要低一些的，相对来讲学生在学校活动也是比较安全的。”市政协委员、黄城根小学校长麦峰认为，政府买单满足“双职工”家庭接孩子难的问题，做的是保底线的工作，就是安全地将学生托管到下午5点半。对于家长和孩子的个性化需求，学校可以适当收取费用。

解决办法:

补习减负，管理和观念并行

对于社会狂热的补习潮，媒体界流行“剧场效应”这一名词。 所谓剧场效应，指的是在一个剧场里，前排的观众不守规矩站起来，则后排的观众也跟着站起来，最终导致整个剧场的人都站着看演出。而教育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学生去校外进行超前补习提升了成绩，其他人只能纷纷效法。

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否认了这一现象在现实中的合理性，“剧场效应是对剧场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剧场里的人不可能站起来，因为每个剧场都有保安”。

他认为解决课外补习过热乱象之根本还要借助政府的手腕，依靠政府监管来维系一个相对公正的教育环境。

课外补习因为相伴着学校教育而生，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一直以来被称为 “影子教育”，在杨东平看来，如果学校教育改善了，课外补习生存的土壤也就失去了。他建议国家应该重点提升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

薛海平认为，学校可以不拘泥于应试课堂的单一形式，推广多样化教育，在学生培养目标和课程设计、教学方式上走多元化道路，以满足学生和家长对于教育个性化的需求。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相继出台的小学“3点半”放学的规定，有一些家长因为无力接送孩子只能将孩子送到补习班这类托管班，变相助长了补习热。针对这一现象，各地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比如上海规定中小学校后服务要做到百分之百全覆盖，服务的时间是3点半到5点，参与这项服务的老师在效益工资方面给予倾斜；而北京规定3点到5点期间是校后服务时间，主要内容是开展课外活动，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900元。

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课外负担，改革评价体系是釜底抽薪之策，但这并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现有的大环境下，熊丙奇认为可以借鉴他山之石。

比如在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实施宽松教育，一星期只上五天课，结果导致很多学生利用双休日的时间去校外补课。在经过各方权衡之后，日本的一些学校重新选择了一周上六天课，以此来减少学生去课外补习机构的机会，最终这一方式被推广到了全国。日方经过评估发现，一周上六天课后，学生的负担比原来上五天课时的负担减轻了。

“在整体的大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日本的学校就通过提升教学质量，改变教学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基于现状所做的一种合理的选择。”熊丙奇强调。

除去政府和学校的作为，身为补课的庞大受众群体，家长的教育观念同样值得进行适度转变。

虽然补习班的盛行存在诸多外部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大环境下家长的焦虑心态依然是最本质的驱动力之一，虽然当下家长的教育理念已然今非昔比，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但“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依然是多数家长的选择。

回归到教育本身，这样的追逐值得深思。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名誉教授赵勇看来，未来社会所要求的每个人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意味着教育应该多“扬长”，而非“补短”，因为看似每个阶段标准化的“完美”并不意味他在将来社会就一定能够成功。

从长远上看，中国基础阶段的评价方式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着，整体的教育目标已经由“双基”向“学生核心素养”转变。

薛海平建议每个家长能够保持一种更为冷静理性的心态，“人生毕竟不是一场百米赛跑，而更像一场马拉松，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保留住他对学习和知识的热情才是最关键的事。”

解决问题，从深化供给侧改革开始

【进展】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教育部要求各地集中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截至8月20日，全国已摸排培训机构38.2万家，其中发现问题25.9万家，已经整改4.5万家。

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构建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总体制度框架。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务求今年年底全面完成整改。

随着校外培训机构迅速扩张，相关问题和风险加剧也是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比例不足20%。很多机构存在着教学质量没有保障、定价随意而混乱，聘用教师无资质、教师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为整治校外培训野蛮生长现状，各地都在积极行动，边摸排边整治，“奇招”不少：微信举报、鼓励民众监督、建立管理平台、黑白名单制度……

不过，在拥有大量资本注入、更有数以万计“起跑线恐慌”的家长支持的情况下，如何让整改后的校外培训机构坚守红线?

从治标看，能否实现应管尽管很重要。目前，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由教育、民政、工商部门多头发放，谁是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主体并不清晰，容易导致监管缺位。因此，需要在做好部门协同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社会力量参与治理。

老师、家长在引导孩子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李小若建议，当前给学生减负的核心是教会学生思考自己人生和未来的方向。这需要老师、家长更多地与孩子沟通，让孩子知道怎么学，“这比上多少课外辅导班、加大作业量、不停地考试都更有效果”。

从根本上说，由于当前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无限大，教育供给又没做好，才造成供需矛盾突出。

薛二勇认为，教育供给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现实原因，父母需要工作，学校课堂时间严格控制，学生们放学后只能到校外培训机构。其次，当前教育系统内部没有提供足够多的、满足孩子多样化教育需求的供给。第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成绩存在压力和焦虑，这种焦虑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评价陈疾。此外，一些培训机构本身在开展针对性教学、提高孩子成绩方面有创新、有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家长把孩子送到培训机构的需求。

“校外培训壮大是当前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的一个影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表示，当教育体系能把正常的教育功能包纳其中，就没有必要产生很多培训机构。这个体系问题越多，校外培训机构的体量就越大。

他认为，现在教育体系在管理和评价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考试分数功能被异化，学校发展不均衡，分数成为进入好学校的主要标准。这些都导致大部分学生为了提升分数而选择报课外班。

“完善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要从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开始。”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志成对记者表示，一个和谐的、严格的教育体系应该是以学校教育为主、校外教育为辅的相辅相成关系。这需要二者共同努力，完善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评价体系，同时引领好教育文化和社会风气。

原因：

原因:有两大因素助长了课外辅导班的风气：一是在幼升小、小升初等考试招生过程中，过度关注“特长”、“超常”等因素，导致一部分学生拔苗助长，通过课外辅导班快速扩大知识面并提高成绩；二是一部分校内的老师在校外辅导班兼职，对于班级的同学上课外辅导班多有鼓励，无形之中助长了孩子们校外加课的风气。足见，校外辅导班的盛行，根源在校内。正是由于招生制度不科学、人才选拔机制不合理、应试教育的痕迹过重，才给校外辅导班以生存空间。

我的想法：

考虑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培训？

借鉴德国

教师应提高自身素质，不得在外授课，借鉴新加坡

中小学要效仿高中，或德国实施6分制度，无特长招生

借鉴美国，学校和社区共同合作，

课后托管应允许第三方机构进校提供服务

t